

從西方至天津的本地化福音運動 ——以清末宣道會守真堂行動經驗為中心的考察 (1895-1900)

倪步曉

(香港建道神學院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

摘要：1895年至1900年，美國宣道會傳教士伍約翰夫婦在中國天津開展傳教活動，他們主要在學生群體傳教並建立教會，繼之將傳教範圍擴及全國，這與其他教區的傳教模式有所不同，未將傳教範圍局限於某區域。本文探討天津守真堂在短短五年時間，所建立的教會融合了本土區域因素，包含傳教士注重與初信的學生等群體，共同致力承擔向華洋並舉的傳教活動，並由中國人為主體的早期本土福音佈道團，反映出普世福音精神在華的行動經驗。因此，本文闡述天津守真堂的佈道事業，展現他們注重普世福音在地方社會關聯性的傳教特徵。

关键词：宣道會、天津、守真堂、本土佈道團、福音運動

作者：倪步曉，香港建道神學院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通訊地址：香港長洲長洲山頂道22號。電話：(852) 94019227；電郵：nehemiahnee@163.com

引論

1860年天津開埠後，英美基督教五大差會隨之東傳，即有美國公理會、英國聖道堂（循道公會）、倫敦會、美以美會和英國聖公會先後紛至沓來，除了在天津地區傳教外，他們還向鄰近鄉村及華北地區發展。⁽¹⁾及至清末時期，傳入天津的基督教各差會傳教策略雖有異同，其成果也是較為豐富。由此引起當今學界對天津基督教差會的研究關注，主要包括各差會所舉辦的教育、醫療、慈善、報業等社會活動，以及傳教士與基督徒個案，基督教青年會研究等等，所反映出基督教在社會的貢獻。⁽²⁾除卻上述主要差會及其宗教活動，當前學界對天津基督教各差會的歷史發展及整體性研究尚不多見，其中亦是晚清來到天津的美國宣道會，仍是研究空白之處。相較於其他差會，宣道會進入天津較晚，受制於自身實力，傳教策略有著差異，就很少得到關注，則宣道會在天津是有重要議題，亟待挖掘。再則，學界關注宣道會主要集中在華南、華西和華中教區，卻對宣道會在天津的工作尚未研究，顯然這是一段值得關注的基督教在華傳教史。⁽³⁾

(1) 本文所言及基督教的用詞，均是指基督新教（Protestantism），並不包括天主教和東正教等基督教派。

(2) 趙天鷲 Tianlu ZHAO：《宗教信仰與近代天津社會生活研究》Zongjiao Xinyang yu jindai Tianji shehui shenghuo yanjiu 【A Study on Religious Faith and Late Tianjin Social Life】（北京 Beijing：宗教文化出版社 Zongjiao wenhua chubanshe 【Religious and Cultural Press】，2018），頁19-25；侯傑 Jie HOU：《張伯苓：提倡體育教育與中國人心靈重建》ZHANG Boling: Tichang tiyu jiaoyu yu Zhongguo ren xinling chongjian 【ZHANG Boling: To Promote Physical Education and the the Reconstruction of Chinese People's Spirits】，香港 Xianggang：香港教育學院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中心 Xianggang Jiaoyu xueyuan jiaoyu yu xinling jiaoyu zhongxin 【Hong Kong Education College: The Center for Religious and Spiritual Education】，2011；侯傑 Jie HOU編：《天津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書系》Tianjin Zhonghua Jidujiao Qingnianhui shuxi 【China Christian Young Fellowship in Tianjin】，天津人民出版社【Tianjin People's Press Tianjin Renmin chubanshe】，2015；王小蕾 Xiaolei WANG：《全球地域化視域下的天津青年會研究（1895-1949）》Quanqiu diyuhua shiyu xia de Tianjin qingnianhui yanjiu 【A Study on the Tianjin Young Christian Fellowship in the light of Globalization】，北京 Beijing：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China Social and Science Press】，2016；

(3) 華裔學者吳秀良 Liangxiu WU，在其《李叔青醫生》Li Shuqing yisheng 【Doctor Shuqing LI】一書，有數章內容是講述守真堂的發展，而限於材料不足，卻未詳論守真堂的發展格局。吳秀良 Xiuliang WU：《李叔青醫生》Li Shuqing yisheng 【Doctor Shuqing LI】，北京 Beijing：九州出版 Jiuzhou chubanshe 【Jiuzhou Press】社，2012。

1893年夏季，宣道會的創辦人宣信（A. B. Simpson）一行人來到中國，為期六十多天的訪問，此行宣信提出一項重要計劃，宣道會在中國設立五個傳教區，即華中區、西北區、華南區、華北區以及北京區。⁽⁴⁾他們作為一個致在內陸地區範圍，是以開拓「未得之地」的差會團體，主要不是集中較多傳教資源在沿海城市。從一種程度而言，宣道會在華傳教區有不同的地域性，從而形成區域性的教會格局。晚清時期，北洋通商要地的天津地區，宣道會將其設為支援華北教區的傳輸站，卻因著天津的地理條件，為宣道會創造一個出乎意料的傳教環境。作為一個注重傳教運動的差會，傳教士在天津開展的宗教活動，如何推動拯救靈魂、關懷社群的福音運動，以何種方式擴大福音的範圍，呈現出一種有別於其他教區的行動經驗，以及所產生怎樣的影響，這是本文考察宣道會在天津建立的「守真堂」為主要線索。本文嘗試從時、地、人三方面，逐一解答上述問題，並討論守真堂致力的傳教活動，如何展現向中國人與其他國族的普世福音精神。為了較全面考察守真堂的活動情形，本文以傳教士的手稿、書信和差會檔案，結合相關的中文文獻，具體介紹宣道會在天津的歷程，再延伸至他們於天津之外所開展的傳教活動，它的傳教行動經驗奠定了宣道會在中國本土化基礎因素。

一、伍約翰夫婦與天津守真堂的創立

天津作為華北地區的商務地區，其交通發達、人口密集且流動頻繁，又自清末開埠以來，天津不僅是京師的門戶，更是中西商賈行絡繹於途，逐漸成為北方重要的通商與外交口岸。⁽⁵⁾1870年天津教案是形成天津制度改變的重要原因，李鴻章調任直隸總督兼天津通商大臣的數年間，將中外之緊張關係轉為緩和，亦在天津興辦洋務事業，其地位在清王朝政治權力及官僚架構中水漲船高，成為受人注視的中西匯聚區域。⁽⁶⁾李鴻章在天津以籌備海防為目的，興辦天津電報學堂（1879年）、天津北洋水師學堂（1880年）、天津武備學堂（1885年）等新型學校，收招了直隸、山東和東南沿海的年輕學生匯聚在天津學習，專門培育科技、製造和工程等方面的人才。⁽⁷⁾同時，天津的洋務運動牽引著社會的變換，讓此時期的人接觸更多西方科學新知，在新風氣、思潮的激蕩下，地方社團如閱讀社、宣講所、講習會等活躍起來，也鼓勵了地方士紳社會參與，一時間天津在啟迪民智、針砭時政有不同以往的自由作風。⁽⁸⁾其時天津的基督教差會，也意識到社會的開放風氣，順遂潮流積極投身本地傳教事業，以期發揮傳教影響力。如天津海關稅務司興辦學校，聘請原美國公理會傳教士丁家立（C.D. Tenney）為北洋西學學堂第

(4) 宣信建議在中國要開關具體的區域，有五個具體的方向：首先是南方的廣西；第二，中部的安徽；第三，以武昌為切入點，往西北傳教；第四，首都北京；第五，華北的山西。A.B. Simpson, Larger Outlooks on Missionary Lands (New York, The Christian Alliance Publishing, 1893), 408; "Editorial Correspondence," The Christian Alliance and Missionary Weekly, Vol. X, No. 11 (16 June 1893), 371-372. "Our Work in China," The Christian Alliance and Missionary Weekly, Vol. XI, No. 24 (15 September, 1893), 164.

(5) 《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Chou ban yiwu shimo 【The Starting and End of Planing the Barbarian Affairs】(Xianfeng) · 卷71冊8（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China Press】· 1979）· 頁2681。

(6) 梁元生 Yuansheng LIANG：〈清末的天津道與津海關道〉Qingmo de Tianjindao yu Jinhaiguandao 【Tianjindao and Jinhaiguandao in the end of Qing Dynasty】《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Zhongyuan yanjiuyuan Jindaishi yanjiusuo jikan 【The Collection of the Institute of Late History at China Academy】第25期 No. 25（1996）：130。

(7) 張堂之 Qizhi ZHANG 主編：《晚清民國史》Wan Qing Minguo shi 【A History of Late Qing and Republic of China】（台北 Taipei：五南圖書出版 Wunan tushu chubanshe 【Wunan Press】· 2002）· 頁72。

(8) 吉澤誠一郎 Jize chengyilang 【Yoshizawa Seichiro】：《天津の近代：清末都市における政治文化と社会統合》【Modern Tianjin: A Cit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Political Culture and Social Integration】（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2）· 頁385-388。

一任總教習；⁽⁹⁾ 倫敦會傳教士馬根濟 (J. K. MacKenzie) 在天津所建立的西醫院，對基督教在天津的傳播起到重要作用。⁽¹⁰⁾顯然，晚清改革的訴求下，國人轉向西方學習，西教士因洋而貴，為基督教的傳教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1893年8月，瑞典裔美國傳教士範嵐生牧師 (Fredrik Franson) 到瑞典，慣常舉行聖經班及福音佈道大會。受範嵐生的感召，相繼有63位瑞典人加入宣道會，被派往宣道會華北教區，即山西省和蒙古一帶，範圍從東到張家口，西達甘肅邊界，南到大同等地傳教活動。短短幾年，他們建立十餘個福音傳教站，成績頗為顯著。⁽¹¹⁾鑒於華北與北京教區同位於內陸地域，需要從海外物資補給，美國宣道會計劃在天津設立業務站。因此，1895年受到美國宣道會差派，傳教士伍約翰夫婦 (John and Katherine Woodberry) 一家前往天津，專門負責業務部門的工作。⁽¹²⁾

伍約翰於1855年出生美國密歇根州大急流城 (Grand Rapids) 的一個農場，父母親是衛理公會 (Methodist Church) 虔誠的基督徒，自小他就受到宗教信仰的熏陶。伍約翰成年之後，與當地衛理公會牧師的兒女凱瑟琳 (Katherine) 結婚，他們一同負責教會的家庭聚會和主日學。多年來，伍約翰也是一個成功的商人，經營數家五金店，為此有富裕的生活。直到伍約翰37歲這一年，他的生意業務利潤大幅縮水，使他有重新思考人生軌跡。在一次宣道會聚會中，伍約翰夫婦被「四重福音」深刻吸引，並回想起他年輕之時，曾立志全時間奉獻自己服事上帝。那一刻：「他們被真理深刻促動，塵世的野心破滅了，生活發生變化，寶貴的孩子被放在上帝的祭壇上，中國成了兩人明確的呼喚。」於是在1893年，伍約翰夫婦決定廉價出售房屋，協同四個孩子前往宣道會紐約傳教訓練學校，有一年時間的培訓。然而，宣道會海外傳教理事會任命一位年近四十歲且還擁有四個孩子的人，到海外傳教工作顯得格外謹慎。董事會經過對伍約翰夫婦多番評估後，委任適合他們的傳教崗位，因應他曾經在商業管理富有經驗，又有照顧數個孩子的能力，故委派他到天津擔任華北教區的業務負責人。⁽¹³⁾

1895年5月，伍約翰一家奉派抵達天津，嫻熟地開展物資業務，深受傳教士們的好評。⁽¹⁴⁾同時，按照宣道會海外傳教理事會的指示，他們在天津學習中文，為到內陸地區傳播福音作準備。因此，伍約翰夫婦早期大部分時間是用在學習中文，和初來華的傳教士既沒有兩樣。然而，因卻年齡較大在中文學習上能力上顯得嚴重不足，於是不再多花時間在語言學習，而是用英語直接在天津街頭佈道。⁽¹⁵⁾ 是年的6月，伍約翰

(9) 羅樹偉 Shuwei LUO 主編：《近代天津城市史》Jindai Tianjinshi shi【A History of Late Tianjin City】(北京 Beijing：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China Social and Science Press】·1993)·頁233；北洋大學—天津大學校史編輯室 Beiyang daxue - Tianjin daxue xiaoshi bianjishi【The Office of the Historu of Beiyang University-Tianjin University】編：《北洋大學——天津大學校史（第一卷）》The History of Beiyang daxue - Tianjin daxue xiaoshi I【The Historu of Beiyang University-Tianjin University I】·天津：天津大學出版社 Tianjin daxue chubanshe【Tianjin University Press】·1990。

(10) 余新忠 Xinzhong YU、楊璐璋 Luwei YANG：〈馬根濟與近代天津醫療事業考論——兼談「馬大夫」與李中堂「興醫」的訴求歧異與相處之道〉Ma Genji yu Jindai Tianjin yiliao shiye kaolun - Jiantan Ma Daifu yu Li Zhongtang xingyi de suqiu qiyi yu xiangchu zhidao【A Study on John Kenneth MacKenzie and the Medical Ministry of Late Tianjin - On also the Distinction and the Way of Engagement between Doctor Ma and Prime Minister Li】·《社會科學輯刊》Shehui kexue jikan【Collection of Social Sciences】第三期 (2012)。

(11) “Fredrik Franson-Missionary Trailblazer,” *Research and Reference Material on the History of The North and Central China Mission of the C&MA, Volume One:1888-1934*, (in the C&MA National Archives),84-85.

(12) “China,” *The Report of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for 1895*,16.

(13) Ora Woodberry, “John Woodberry,” *The Alliance Weekly: A Journal of Christian Life and Missions*, Vol. LXXIII, No.43 (22 October, 1938),677-678.

(14) “China.” *The Christian Alliance and Foreign Missionary Weekly*, Vol. XV, No.3 (17 July,1895),34.

(15) Dr. W.P. Chung, “Beulah Chapel, Shanghai, China.” *The Alliance Weekly: A Journal of Christian Life and Missions*, Vol. XLVII, No.25 (24 March,1917),395.

夫婦巧遇天津北洋西醫學堂的青年學生，他們是清政府訓練的預備醫生，可以通順地用英語交談。⁽¹⁶⁾在伍約翰的邀請下，每週日下午他們到伍家做客且共進晚餐，其時有讀聖經聚會，談論基督信仰的環節。同時，伍師母在客廳彈鋼琴，夫妻二人一同隨著鋼琴合唱英文福音詩歌，從而營造不同的氛圍，⁽¹⁷⁾這在當時天津是一件前所未有的事，他們也受到批評，多數傳教士不會公開接待中國人到家中，而伍約翰夫婦卻從一開始就歡迎他們的到來。因此，在學生群體廣為流傳「城內這個奇怪的傳教士」的消息。⁽¹⁸⁾經過幾個月，有數十位學生定期到伍約翰家中，包括天津其他學校的人參加聚會。不僅如此，學生們返回學校，也會積極與同學討論所聞基督教的內容。⁽¹⁹⁾由於這群年輕人是遠離家鄉的學子，不受家庭的傳統束縛，相較能自行決定歸信基督教。半年過後，伍約翰夫婦在當地的努力有了收穫，學生固定參與聚會，其中有十二名醫學生歸信受洗，熱心信教。⁽²⁰⁾其時決定信教的學生有倪文德、⁽²¹⁾柳資生、⁽²²⁾姜文熙、⁽²³⁾陳懷皋、⁽²⁴⁾李叔青、⁽²⁵⁾

(16) 天津北洋醫學堂 (Medical College) 與清末大臣李鴻章 Hongzhang LI 相關。1881年由李鴻章支持下在天津開辦的一所小型新式醫院，由馬根濟 Ma Genji [John Kenneth MacKenzie] 和美國秘書、翻譯兼顧問畢德格 Bi Dege [Pethick William] 聯合上書李鴻章，建議成立北洋醫學館，挑選聰穎少年子弟隨同學醫，以備考醫官，分赴軍營、戰艦充當官醫。他的英文是 Viceroy's Hospital Medical School (總督醫院附屬醫學館)。這間學校的經費來自直隸省防軍費用。該校自1881年12月開學到1887年共有三屆學生。1889年，北洋海軍在威海衛和旅順港，開辦兩座水師醫院。1893年12月天津儲藥施醫總醫院開院試辦，附設西醫學堂亦籌備成立。天津總醫院下「分西醫學堂、施醫院、儲藥處三大端，專門購儲材料、診治弁兵，並挑選生徒分班肄習，俾學成後派赴海軍各營艦充當醫官，尤為北洋各醫院之根本。」天津總醫院內附設的西醫學堂即後來所稱「北洋西醫學堂」，也常被稱為「北洋醫學堂」、「北洋海軍醫學堂」或「天津醫學堂」，這是近代中國第一所正式的官辦西醫學堂，也是第一所正式的官辦軍醫學堂。上述的西醫院均由李鴻章所創辦和支持。北洋西醫學堂於1894年12月25日正式開學，亦委派歐士敦為醫學總督，先任廣東籍的曲柱庭為敵人總辦（校長），以培養海軍軍醫為宗旨。北洋西醫學堂的學規，學生四年屆滿，得有執照，准以醫學謀生，方許為人診治，如在年限未滿，或已滿而醫學未精得執照者，按照日輪班隨醫官在醫院臨症，准為人診治外，否則不得自作聰明，亂施刀圭，或有錯誤以昭慎重。參楊明哲 Mingzhe YANG: <李鴻章與近代西方醫學在中國的傳佈> Hongzhang Li yu Jindai yixue zai Zhongguo de chuanbu [Hongzhang LI and the Spreading of Western Medics in the Late China] 《長庚人文社會學報》 Changgeng renwen shehui xueyuan [The Journal of Changgeng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第二卷第二期 (2009): 321-323。

(17) Dr. W.P. Chung, "Beulah Chapel, Shanghai, China", 395.

(18) Miss Ora Woodberry (Taped April 13, 1962), 1.

(19) Life of Dr. Y. S. Lee, Evangelist, *National workers in China 1888-1949* (Division of Overseas Ministries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26.

(20) "Tientsin." *The Christian Alliance and Foreign Missionary Weekly*, Vol. XVII, No. 16&17 (16 & 23 October, 1896), 373.

(21) 倪文德 Wende NI，福建福州人。他的父親倪玉成自1862年至1890年擔任福州南台鋪前頂救主堂牧師，與妻育有七子五女共十二孩子，倪文德排名第五，其四哥是倪文修，倪文修有一子名倪述祖（倪悅聲），他是中國教會著名傳道人，亦是基督徒聚會處創辦人。倪文德由於父親牧師的身份，從小接受西式教育，精通英文，通過考試進入北洋醫學堂，後任職北京徐國卿秘書。

(22) 柳資生 Zisheng LIU（生平未詳）是伍約翰在天津第一個帶領信教的學生，在天津醫學堂是學生代表，也是伍約翰早期的中文老師，信教後與伍約翰熱心傳教。

(23) 姜文熙 Wenxi JIANG (1875-1971年)，字體仁。上海川沙城廂鎮人。就學上海中西書院，後考入天津北洋醫學堂，為第二班學生。畢業後，被分配在袁世凱部任軍醫，後調山東濰縣陸軍第三鎮任軍醫。1908年被派往保定東郊首創馬醫學堂（民國後改為獸醫學校，直轄於陸軍部軍醫司），任總辦，民國6年任軍醫司司長。1926年前後被聘為協和醫學院中文部主任。中共建政後，被聘為上海文史館館員，後在文革中去世。他一直是宣道會守真堂的支持者，並參與上海守真堂的創立。

(24) 陳懷皋 Huainie CHEN，北洋學堂第四屆畢業生，他是一名志願醫療傳教士。他曾就讀於聖約翰大學，然後在上海聖盧克醫院學習醫學，最後在天津北洋醫學堂完成了五年的醫學培訓。畢業後在湖南一帶行醫傳教。辛亥革命湘督譚延闓，以省府的名義撥長沙市東茅街什學館房屋為臨時醫院，聘陳懷皋為醫師，診治負傷將士，成效漸著。1924年7月，湖南慈善公所與紅會理事，合組醫院，更名為仁術醫院，陳懷皋為創院之人。一直到1949年，仁術醫院由湖南省人民政府接管（今省人民醫院）。

(25) 李叔青 Shuqing LI (1875-1908)，江蘇南匯縣人。其父是監理會在蘇州的牧師，有兒女共六人，李叔青排行第三。12歲時，他被父親送往西教士所辦的蘇州博習書院讀書，一年後轉入上海聖約翰學院。13歲時受洗，念至高中而休學。為了將來能夠做官賺錢，李叔青於19歲考入天津北洋西醫學堂，在22歲那年接觸伍約翰夫婦後，生活發生徹底改變，過簡樸、敬虔的生活，並十分熱心於傳福音。1897年畢業後，他仍留在學校兩年之久，每天堅持傳講耶穌，在天津帶領多人歸主。26歲時回到上海，先在上海宣道會一段時間，不久去上海中西學校教英文。1904年，他到蘇州，一面教英文，一面傳福音。同年，監理會在蘇州召開大會，請他講道，他的講道充滿能力，此後他聲名遠揚。他在世最後兩年裏（1906-08），先後到上海、南京、蕪湖、寧波、杭州、紹興、江陰、湖南長沙、山東煙臺、周家口等地，四處奔波，主領培靈奮興大會，許多教會因他的講道而得到復興。但長期的奔波勞累，從事講道、培訓、譯書等工作，使他積勞成疾，於1908年8月辭世。

王培元、⁽²⁶⁾張汝舟、⁽²⁷⁾張汝川、⁽²⁸⁾周維廉、⁽²⁹⁾鐘文邦、⁽³⁰⁾經享咸、⁽³¹⁾章錫如、⁽³²⁾吳其芬、⁽³³⁾虞順德、⁽³⁴⁾周龍山⁽³⁵⁾等人。這群基督徒學生畢業後，多半任職醫生等工作，成為了長期支持及參與守真堂的福音事工。⁽³⁶⁾

基督信仰對於學生群體而言，接受洗禮不僅是信仰選擇，更是一種生活方式的改變。甲午戰爭之後，天津瀰漫開放之風，青年學生在一片自由氛圍中，較無拘無束地生活。當時北洋醫學堂的學生，每月可以拿到政府給的十兩白銀廩膳費，他們還用於去劇院、酒館和其他消遣場的地方。為此，伍約翰夫婦尤為注重學生歸信後道德品格徹底的改變。儘管有些學生自小因家庭信教，但信仰根基未穩固，與世俗的生活並未分別。伍約翰夫婦特別重視喚醒他們「重生經驗」(revivalism)，藉著閱讀《聖經》、徹底認罪的行動來表明救恩的意義，從而強調良好的道德生活是信徒信仰生活的開端。⁽³⁷⁾經過伍約翰夫婦的教導，這群學生公開認信基督信仰，宗教生活逐漸取代原社群的習性。⁽³⁸⁾亦因如此，青年學生與伍約翰一家建立深厚密切的關係，稱伍約翰夫婦為「屬靈的父母親」。⁽³⁹⁾當時北京教區的傳教士布朗(Brown)在天津期間，記述這群學生有明顯的生活改變：「這些年輕人說，相信是主帶他們來到天津，不為了醫學堂的訓練，而是為了聽四重福音。他們盡其所能地學習《聖經》，分發福音書籍，並寫信給他們的朋友，敦促他們歸向基督。每天晚上，他們接受伍約翰夫婦教導，並進行有序的聚會。」⁽⁴⁰⁾由此可見，伍約翰夫婦也重視學生信教後，立即投身福音佈道的活動，「街頭那群宣講福音的學生成為了熟悉的景象，亦在廟宇和商舖傳福音，他們到天津各大政府學校宣講真理。」⁽⁴¹⁾那段時期，學生群體初信就熱衷傳教，如認同西方福音運動在華的明顯記號。

(26) 王培元 Peiyuan WANG自天津北洋醫學堂畢業後，到上海創立守真堂上海分堂，並在虹口守真書館擔任教師，負責英語等課程。王培元的妻子是李叔青的妹妹李巧珠，他亦協助李叔青傳道、翻譯工作。1909年，王培元投身紅十字會運動，並加入中國紅十字會總醫院，成為駐院醫生，並任醫院學堂的副校長。王培元擔任中國紅十字會醫師後，參加或主持歷年災害救濟、戰地救護的行動，為紅十字會醫療衛生事業貢獻良多。1929年，中國紅十字會常務會議召開會議，公舉王培元代理事長，主持總辦事處各項事務。1934年王培元卸任理事長，當選為第一屆理事會理事。1942年11月，王培元在上海去世。

(27) 張汝舟 Ruzhou ZHANG，福州人，父親張策侯 Cehou ZHANG 是美國監理會的牧師，長期任職於上海慕爾堂(今沐恩堂)，育有三子三女，張汝舟為長子。1897-1901年在湖南與福州等地開荒佈道。1901年，返居上海，在上海仁濟醫院擔任醫生長達十多年，張汝舟升任上海仁濟醫院副監院。自1913年7月起，張汝舟同時擔任上海明強醫院醫生。除了繁忙的工作外，張汝舟同時熱衷於教會活動。1906至1914期間，張汝舟擔任上海基督教青年會董事。然而，1919年3月17日晚，張汝舟因患流行病去世，年近40歲。他留下三女一子：張品瑋 Pinzheng ZHANG、張品芳 Pinfang ZHANG、張品蕙 Pinhui ZHANG和張宜倫 Yilun ZHANG，都在上海守真堂成長並參與服事。三女張品蕙後嫁給了基督徒聚會處創辦者倪柝聲 Tuosheng Ni【Watchman NEE】。

(28) 張汝川 Ruchuan ZHANG，福州人，是張汝舟的胞弟，亦天津北洋醫學堂的學生，自畢業後長期在福州和天津傳教，後就任南昌鹽務署核算醫生。

(29) 周維廉 Weilian ZHOU，江蘇寶山縣人，為獸醫學專家。清政府曾委派他擔任駐法國巴黎大使命秘書。

(30) 鐘文邦 Wenbang ZHONG，天津北洋醫學堂畢業後，他曾擔任清朝駐美國大使的秘書，後在上海行醫，他是守真堂的財政主要支持者。其女兒鐘慰徽嫁給了王峙 Zhi WANG牧師。二十世紀20年代，鐘文邦的兒子鐘保羅 Baoluo ZHONG是上海守真堂第一位本地全職傳道人。

(31) 經享咸 Hengxian JING，長期任職天津省立醫學校監督。

(32) 章錫如 Xiru ZHANG，長期任職天津大英醫院醫生

(33) 吳其芬 Qifen WU，長期任職天津衛生局醫官。

(34) 虞順德 Shunde YU，長期任職北京京漢鐵路局醫官

(35) 周龍山 Longshan ZHOU，醫學堂畢業後，任職北京陸軍部馬醫總稽查。

(36) 中華續行委辦會編 Zhonghua xuxing weibanhui【The Continuing Office of China】訂：《中華基督教會年鑑(第3期)》Zhonghua jidujiaohui nianjian III【The Yearbook of China Christian Church III】，(上海 Shanghai：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The Commercial Press】，1916年)，頁397。

(37) Life of Dr. Y. S. Lee, Evangelist, 26-27.

(38) Ibid.,27.

(39) "Work in Tientsin."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Vol. XXI, No.2 (13 July,1898),43.

(40) "Pekin, China - Miss Brown." *The Christian Alliance and Foreign Missionary Weekly*, Vol. XVII, No.23 (4 December,1896),525.

(41) Life of Dr. Y. S. Lee, Evangelist, 28.

二、守真堂的身份定位及發展模式

伍約翰夫婦與學生群體雖是小型群體，從全球地域化的視角來看，他們卻是作為一種普世基督教信仰在地方主動性擴展的特徵，即堅持信仰本身且又適應本地環境，在本地爭取人歸信基督信仰的宗教群體類型。⁽⁴²⁾ 隨著受洗人數增長，1896年伍約翰夫婦在他們家中正式建立天津宣道會教堂，取名為「守真堂」（英文是Beulah Church）。⁽⁴³⁾ 傳教文獻記錄到該教堂的開始階段：

當一群學生得救後，他們就聚集在守真堂做禮拜、祈禱和見證。以此基礎，他們立即在城市和鄉村傳播福音。伍約翰喜歡和一個或幾個新歸信的人出去，他們會賣掉成千上萬的福音書。幾乎不懂中文的伍約翰學會了用手指表示每本書的錢數。這些有尊嚴的學生，並沒有立即準備好公開認同外國人和他的宗教，去做卑微的工作，出售《聖經》和福音書籍。不過，他們遇到嘲笑和戲弄的笑聲，始終還是出去，關切天津城和周邊的地區。⁽⁴⁴⁾

可見，伍約翰夫婦建立的守真堂，視為聖經教育和直接佈道一樣重要，且需要長期才有收穫的事業。同時，美國宣道會非常認可伍氏夫婦在天津的耕耘，從而給予他們留在天津的傳教自主空間。⁽⁴⁵⁾ 這也表明傳教士在天津擁有廣泛的自主性，它與宣道會差會提供靈活福音空間是密切相關。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早期伍約翰夫婦在天津的生活及家庭情況卻不太順利。1895年12月底，伍約翰感染天花，持續發燒，病情嚴重，醫生也束手無策，判定他會在當日下午四點病逝。然而，伍師母堅持宣道會的神醫立場，在醫院為他作抹油祈禱、唱詩的儀式，結果伍約翰竟不藥而愈。⁽⁴⁶⁾ 這一段時期，伍約翰的小兒子伍爾（Earl. J. Woodberry）也感染天花，伍師母在家照顧隔離期間的伍爾，十一歲的大兒子伍羅意（Roy. M. Woodberry）在1896年元旦去天津北河溜冰之時，意外掉到水坑裡淹死。⁽⁴⁷⁾ 伍羅意的突然離世，令這個家庭與這群醫學生，陷入巨大的悲傷。伍羅意過往在美國，跟隨父母致力本地傳福音事工，被稱為出色的「小傳教士」，抵天津與醫學生在各校積極傳播福音。⁽⁴⁸⁾ 因著羅意的意外離世，令到曾經傳教對象之一的醫學生張汝舟重新思考生死觀，且性格發生很大轉變，從反基督教到歸信受洗，並且立志繼承羅意的傳教工作。⁽⁴⁹⁾

伍約翰夫婦為了紀念羅意的傳教理想，專門設立「羅意傳教基金會」（Roy's Missionary Fund），⁽⁵⁰⁾ 宗旨是促進守真堂的傳教工作，經費籌募來自中國基督徒和美國宣道會，這項基金也成為守真堂長期支持本地及國外傳教士的津貼。⁽⁵¹⁾ 十九世紀中後葉的美國社會，正處於海外傳教的熱潮，基督教公眾的捐款方興未艾，但宣道會的海外傳教的經費卻有限，提供伍約翰夫婦的日常開銷，儘管守真堂直屬美國宣

(42) "Further News from Tientsin."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Vol. XIX, No.21 (17 November,1897),503.

(43) "Converts and Friends of Beulah Chapel, Tientsin, China." *The Christian Alliance and Foreign Missionary Weekly*, Vol. XVIII, No.26 (25 June,1897),123.

(44) "Branches Running Over the Wall," *Research and Reference Material on the History of The North and Central China Mission of the C&MA, Volume One:1888-1934*, (in the C&MA National Archives),92.

(45) "China." *The Christian Alliance and Foreign Missionary Weekly*, Vol. XVIII, No.17 (23 April,1897),386.

(46) *Miss Ora Woodberry* (Taped April 13, 1962),2.

(47) E.M. Brtckensteen, "A Little Soldier." *The Christian Alliance and Foreign Missionary Weekly*, Vol. XVI, No.13 (27 March,1896),302.

(48) J. Woodberry, "In Memoriam." *The Christian Alliance and Foreign Missionary Weekly*, Vol. XVI, No.19 (8 May,1896),447-448.

(49) *Miss Ora Woodberry* (Taped April 13, 1962),3.

(50) "News From Tientsin." *The Christian Alliance and Foreign Missionary Weekly*, Vol. XIX, No.15 (6 October,1897),359.

(51) "God Uses His Little Ones."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Vol. XX, No.21 (25 May,1898),494; K.C. Woodberry, "Work in Shanghai,"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Vol. XXVI, No.24, (15 June,1901),325; Mrs. Woodberry, "Report of Beulah Chapel."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Vol. XXXII, No.8 (22 May,1909),123.

道會，而守真堂的其他福音傳道人的經費，主要來源親友的志願奉獻。⁽⁵²⁾ 因此，自守真堂建立伊始，即在經費和補助上，信徒群體逐漸形成自行募捐的現象。⁽⁵³⁾



圖一：伍約翰一家與天津守真堂的基督徒合影（1897年）⁽⁵⁴⁾

伍約翰夫婦在天津的第二年，他們家中聚會的人數與日俱增，於1896年秋，伍約翰在美租界的美國領事館比鄰博目哩道（Bromley Road）租賃一棟房屋，將其佈置成教堂形式，地下室是查經班和婦女聚會，小禮堂和傳道人培訓學班設在一層，伍約翰一家居住在二層。⁽⁵⁵⁾ 到1897年春季，守真堂發展有近七十名固定的成員，主要來自天津電報學堂、北洋水師學堂、北洋西醫學堂、天津武備學堂等清政府學校的學生及畢業生。⁽⁵⁶⁾ 這一時期的美租界依然是滿目荒涼，零落散佈著中國人居住的土物草捨。⁽⁵⁷⁾ 是故，守真堂不僅在教堂周圍傳福音，亦定期於天津八十餘個村莊巡迴佈道。

伍約翰領導下的天津守真堂傳教團隊，除了向中國人傳教之外，還在在天津等港口，向外國水手固定福音佈道。自從天津開港通商，設置的海關、領事館匯聚各國船隊水手。許多水手長期在大海生活，存在因酗酒等問題導致生活混亂。為了幫助大量水手戒酒，伍約翰與學生基督徒，每週在船上固定佈道數次，並且在守真堂舉辦水手的基督教活動。許多孤獨的水手，通過基督信仰的力量，擺脫了酗酒等習慣，成為了虔誠的基督徒。⁽⁵⁸⁾ 信教受洗的水手，積極把福音書帶回船隻向水手傳教；時有熱心的水

(52) “Woodberry Mission, Tientsin,” *The Report of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for 1901*, 19.

(53) Miss Ora Woodberry (Taped April 13, 1962), 2; “More for Jesus.”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Vol. XIX, No. 22 (24 November, 1897), 526.

(54) *Research and Reference Material on the History of The North and Central China Mission of the C&MA, Volume One: 1888-1934*, 123.

(55) Mr. and Mrs. John Woodberry, “Beulah Chapel and Training School of the C. and M.A.”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Vol. XIX, No. 21 (17 November, 1897), 487.

(56) Mr. and Mrs. John Woodberry, “Beulah Chapel and Training School of the C. and M.A.”, 487.

(57) 尚克強 Keqiang SHANG: 《天津租界社會研究》Tianjin zujie shehui yanjiu【A Study on the Rent Areas in Tianjin】（天津人民出版社 Tianjin renmin chubanshe【Tianjin People’s Press】，1996）·頁159。

(58) “God’s Blessing at Tientsin, China.” *The Christian Alliance and Foreign Missionary Weekly*, Vol. XVIII, No. 24 (11 June, 1897), 571.

手會請假，陪同伍約翰一行人，外出十餘天至華北地區巡迴佈道。可見，守真堂的信徒成員，有一部分是西方水手組成，他們為戒酒提供了有價值的社會服務。⁽⁵⁹⁾

晚清天津港口也形成「南船北至、帆橋絡繹、水手如雲、百貨雲集、市聲鼎沸」的繁華局面。⁽⁶⁰⁾守真堂也進入中國商船福音佈道。其時伍師母敘述到：「在福祉號上，一個水手兄弟許先生，他在250名異教徒水手中，是最勇敢的見證人。他只要時間允許，他就會跪下祈禱。錯誤的指控和懲罰，換來的是他為敵人的祈禱，與背負十字架的聲明。這些中國歸信者成為天國最閃亮的寶石之一。」⁽⁶¹⁾儘管受到壓迫，許先生與張汝舟等人，仍然積極向中國水手佈道，從而逐步收到成效。⁽⁶²⁾如北洋水師東極號艦隊艦長李何（Li Ho）在1897年10月天津守真堂歸信。⁽⁶³⁾

除了天津地區的佈道工作之外，守真堂的傳教活動涉及一百三十多公里以外的北京地區，約有四至五天路程。自1896年至1898年，守真堂在該區域的福音佈道頗有成效，每年售賣的福音書籍約有三萬餘冊。⁽⁶⁴⁾及至1899年宣道會總部的傳教報告記述了顯著的成果：

在這一年時間，他們在天津及周圍地區的一百多個村鎮、鐵路和河流旅行中，開展逐家佈道工作。北京和天津這兩個城市被系統地走遍大街小巷、商鋪到茶樓等地，並出售近三萬份福音書籍。此外，他們也到亞瑟港（或稱旅順口）、芝罘佈道。我們知道，在所有海外傳教活動中，沒有比天津本土傳教工作的精彩故事更引人注目的記錄了。⁽⁶⁵⁾

由此可見，在伍約翰夫婦主張福音運動模式下，這間天津守真堂既由天津到華北地區傳教範圍，亦具備向本地與洋人兼顧的差傳教會特徵。

與此同時，守真堂普世性的宏觀，並不在乎他們在天津人數規模大小，而是看重是否參與一個超越本地範圍的福音運動。在他們的公開信中說到：「從客西馬尼和加略山對靈魂的熱情中，誕生了一場傳教運動，這在中國傳教的故事中是難以比擬的。在大量的祈禱之後，一個計劃形成了，我們參與幫助在大帝國的每個省的福音傳道。」⁽⁶⁶⁾從1897年至1898年期間，守真堂以此目標，籌募到兩千美元，其中近一千美元由天津的學生基督徒捐贈，以此支援中國十八省各一位本地傳道人的經費。⁽⁶⁷⁾而這些本地傳道人多數不是宣道會背景，來自安順、南陵、辰州、南寧、福州、寧波、上海、長沙、湘潭、九江、奉城、韓城等地區。⁽⁶⁸⁾

近代基督教海外傳教運動是一種涉及廣泛地域的普世性運動。亞洲、非洲等基督教世界以外都是傳教開拓的地區。隨著傳教運動的規模日益擴大，傳教機構在經濟上的壓力也日益彰顯，這是提出本土

(59) "God's Blessing in Tientsin."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Vol. XXI, No.1 (6 July, 1898), 19.

(60) 天津市地方誌編修委員會 Tianjinshi difangzhi bianxiu weiyuanhui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of Local History of Tianjin】：《天津通志：政權志·政府卷》 Tianjin tongzhi: Zhengquan zhi, Zhengfu juan 【The Whole History of Tianjin: the volume of Governments in Power】（天津 Tianjin：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Tianjin shehui kexue chubanshe 【Tianjin Social Science Press】，1996）·頁135。

(61) "Work in Tientsin."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Vol. XXI, No.2 (13 July, 1898), 43.

(62) Y.C. Chang, "A Chinese Evangelist."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Vol. XXII, No.1 (December, 1898), 7.

(63) K. Woodbury, "Baptisms at Tientsin."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Vol. XX, No.1 (5 January, 1898), 3.

(64) Mrs. K. C. Woodberry, "The Remarkable Work of a Chinese Convert."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Vol. XXI, No.20 (19 November, 1898), 458-459.

(65) "Northern China," *The Report of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for 1899*, 23-24.

(66) Henry Wilson, "Alliance Work in Tientsin, China."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Vol. XX, No.22 (1 June, 1898), 507.

(67) Ibid., 507.

(68) K.H. Woodberry, "Five Years in Tientsin."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Vol. XXV, No.1 (7 July, 1900), 1-3.

教會應結束依賴傳教士的供給而實現「自養」的直接原因。(69) 而天津守真堂在早期就已經實現本地教會自養、自傳的理念，並通過累積捐款，將範圍擴大至海外傳教運動。1898年3月，伍約翰夫婦寫信委請美國宣道會：「在我們其他國家的每一個傳教領域，請指派一名本地工人，以便於我們可以在世界各地的每一個領域，獲得支持本地傳教工作。」(70) 未及，宣道會理事會按照守真堂的意願，將他們的經費支援巴勒斯坦和印度的傳教事工。(71) 之後的兩年，守真堂每月定期舉行「傳教大會」，以提振參與者的福音熱誠並樂於捐助，籌集每年超過三千美元的差傳經費，這項專案經費分別支持日本、非洲、印度、巴勒斯坦、蒙古和南美洲等國共有26位福音傳道人。(72)

美國宣道會還特別以守真堂為例，來說明海外差傳建立本土自養、自傳教會的基本模式，「天津守真堂的傳教觀，奉獻自己符合早期教會的模式。他們的部門有幾項突出的特點：他們非常注重傳福音、售賣書籍，在街頭向路人傳教；並且他們四處旅行，試圖觸及關鍵城市，以便可將福音傳播到其他地區。從一開始，伍約翰就讓信徒們感到經濟責任，鼓勵他們奉獻；同時也重視信徒盡快領導福音工作。」(73) 可以說，這一時期天津守真堂在有限的人力的情況下，已盡全力在中國開展傳教功能，這也已經遠超美國宣道會預期；因此，他們形容守真堂在天津的故事為「傳教奇蹟」，也是宣道會中的佼佼者。(74)

三、守真佈道團創立及其在華傳教運動

自1897年初，即守真堂另創新局，守真堂在學生群體的佈道成果，成為他們推動在中國福音運動的動因。伍師母在信件中說道：「幾個月來，天津北洋西醫學堂裡的學生基督徒一直在祈禱，希望主為他們打開一扇門，讓他們不受阻礙地傳福音。且後，他們中的三人可以自由地第一次組成佈道團，開始傳教之旅。這很可能是中國人首次自發佈道團向國內傳教運動的開端。」(75) 正是因應學生的福音熱忱甚為明顯，守真佈道團在這一年正式成立。佈道團由一班學生及青年群體組成為主，西教士只擔任顧問角色，在他們努力下，每逢假期、工作之餘，投身在街頭佈道及遠行福音工作。(76) 守真堂佈道團透過定期佈道，多年來成績斐然，決志信主者達數百人，並展現佈道團的多項特點：

第一，守真堂要求參與佈道團的人，第一要務是表現成熟基督徒屬靈生命的成聖。伍約翰夫婦的神學思想框架屬於宣道會的前千禧年末世主義觀，即基督再臨前，佈道團致力直接佈道，竭力拯救人的靈魂。如醫學生李叔青有一定代表性，他在守真堂期間，熱心信教，立志作福音傳道人。伍約翰夫婦對他強調，要有屬靈生命的成熟，才會結出福音見證的果子。從那時起，李叔青注重祈禱和研讀《聖經》，並於同學、醫院病房頻繁佈道。自醫學堂畢業，對世俗生活不感到興趣，福音佈道成了他追

(69) 吳義雄 Yixiong WU: <自立與本色化——19世紀末20世紀初基督教對華傳教戰略之轉變> Zili yu bensehua - 19 shiji mo 20 shiji chu Jidujiao dui Hua chuanjiao zhanlv zhi zhuanbian 【The Change of Christian Missio to China during the end of 19th century and the beginning of 20th century】《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Zhongshan daxue xuebao (Shehui kexue ban) 【The Journal of Yatse Su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Version)】第44卷第6期（2004）：125。

(70) "Our Missionary Work," *The Report of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for 1898*, 23.

(71) "Northern China," *The Report of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for 1898*, 46.

(72) "North China Mission," *The Report of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for 1900*, 70-71.

(73) "Alliance Work in Shanghai," *Research and Reference Material on the History of The North and Central China Mission of the C&MA, Volume One: 1888-1934*, 243.

(74) Henry Wilson, "Alliance Work in Tientsin, China", (1 June, 1898), 506.

(75) "Fredrik Franson-Missionary Trailblazer," *Research and Reference Material on the History of The North and Central China Mission of the C&MA, Volume One: 1888-1934*, 92.

(76) "North China,"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Vol. XXII, No. 6 (May, 1899), 177.

逐的理想。(77) 可以說，守真佈道團的信仰宗旨深受伍約翰夫婦的影響，儘管他們是社會為數不多的專業醫生，日常兼顧醫療工作，但他們致力在福音佈道，無意扮演專業醫療傳教的工作，顯然反映出守真佈道團的直接傳教路線。因此，該佈道團主要是在促進信徒的傳道熱情和提高他們的靈性方面起了非常關鍵的作用。

第二，守真佈道團在經費較為充裕條件，開始全國性的佈道事工。有人在華北地區逐家佈道活動，也有人在南方地區尋覓傳教機會，家鄉和「未得之地」也是他們重視的傳教區域。在1897年，佈道團成員張汝舟和張汝川兄弟二人，回到家鄉福州，聚集了張家數十人，以及來自福州中西學堂的七八十名學生，以此創立福州守真堂（Beulah Chapel No. 2）。由張氏兄弟二人的領導下，他們在福建省內開展巡迴佈道。(78) 由於成果頗豐，宣道會記述張氏兄弟在福州的工作情形：

他們回到福州的一晚，兩兄弟都夢到見上帝讓他們把自己的家奉獻出來。於是，他們醒來就開始動手，開始佈置聚會場所，熱情地宣講四重福音。他們召集三場大型的傳教、學生等公開聚會，最後一次「主的再來」為主題。他們的教會聚集了六十名願意獻身傳福音的年輕人，並在周邊地區巡迴佈道，且取得顯著成績。在這些巡迴佈道中，他們穿越平原和陡峭的山坡，從一個村莊走到另一個村莊，向遇到的每個人佈道，分發藥物、售賣福音書籍，並假路邊的小教堂舉行禮拜，每晚指導當地牧師到凌晨。伴隨著他們的手風琴，在鄉村裡唱歌，救世軍的風格，吸引了大批群眾後，他們分散到各個方向進行忠心的工作。他們還組織了婦女聚會，醫院探訪、福州長橋的佈道。這些年輕人除了對上帝的信仰之外沒有其他資源。(79)

可見，福州的守真堂注重信徒短期、密集和集體外出的佈道活動。再則，張氏兄弟亦為信徒提供靈性牧養和門徒訓練，基本仿效天津守真堂的運作模式。(80) 雖說福州的守真堂在組織上是一間教堂，而張氏兄弟更多集中在福音佈道。他們在一艘福音船上建立「浮動守真堂」，船上可以容納數十人，分為男女兩個部門。(81) 浮動的守真堂沿著河流，到不同村落，宣傳福音，雖有遇窘逐危險者不少，仍然熱衷傳教，三年之間已遍歷福州以南數百個大小的村莊，聞其福音效果頗佳。(82) 值得注意的是，因福音船歸信的人，多半就近到其他的教堂，故佈道團的宗旨，並非建立日常牧養的教堂功能，則與各地不同宗派教會合作，有人信教後到其他教會得到牧養。由是觀之，佈道團在福建始終沒有建立具規模的信徒群體，做開拓佈道工作為主。(83)

這時期的伍約翰有一個強烈的願望：「在上海開設一個學生教堂，因上海是中國的天然門戶，所有的旅行和交通都過這裡，以及是一個大型的學生匯聚中心。」(84) 在1898年3至4月，天津守真堂收到接近2,600美元的奉獻，伍約翰將這筆錢用於支持福音傳道人及開拓上海福音事工之用。(85) 翌年夏季，北洋醫學堂的畢業生王培元醫生和陳懷皋醫生受佈道團委派，啟程前往上海開展福音佈道。(86) 夏季過後，伍約翰夫婦一家抵達上海，他們一邊與佈道團成員遍及街頭、商鋪、學校、商船傳道賣福音書籍。

(77) Life of Dr. Y. S. Lee, Evangelist, 28.

(78) Mr. and Mrs. John Woodberry, "Beulah Chapel and Training School of the C. and M.A.", 488.

(79) Mrs. Woodberry, "The Work in Tientsin."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Vol. XIX, No.21 (17 November, 1897), 500.

(80) "Work in Tientsin."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Vol. XX, No.3 (19 January, 1898), 66-67.

(81) Henry Wilson, "Alliance Work in Tientsin, China", 508.

(82) "A Remarkable Chapter in Self-Supporting Mission."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Vol. XXIII, No.6 (8 July, 1899), 81-83.

(83) Y.C. Chang, "A Chinese Evangelist," (December, 1898), 7.

(84) K.H. Woodberry, "Five Years in Tientsin." (7 July, 1900), 2.

(85) Ibid., 3.

(86) "New of our Chinese Evangelists."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Vol. XXIII, No.20 (14 October, 1899), 323.

另外一邊，他們尋找固定房屋作教堂使用。(87)於10月9日，伍約翰夫婦在熙華德路3號 (Seward Road, 現長治路) 租賃房屋，將教堂管理交於王培元，按照天津守真堂的樣式來佈置，這是第三間的守真堂 (Beulah Chapel No. 3)。(88)上海守真堂在籌備運作期間，佈道團主要在上海講英文的中國人間開展福音佈道。(89)

此外，天津守真堂佈道團將其傳教範圍也擴至華中地區。1898年，佈道團沿著長江登上千條貨輪，向船員發送數萬本的福音小冊，一直到湖南地區，佈道團多番尋找進入中國排外激烈的長沙。(90)在1899年夏季，佈道團的張汝舟夫婦和陳懷皋醫生，偕同福音傳道人郭先生和黃先生等一行六人抵達長沙，租賃一間房子，容納教堂、住宅、藥房之用。佈道團稱之為第四間守真分堂，即長沙守真堂 (Beulah Chapel No. 4)。(91) 教堂開設的第一個月，由於張汝舟等人是以外省身份在長沙城傳教，受到官府排斥，導致在本地人多次驅趕的反教浪潮下，暫時撤離至湘潭。(92) 但他們仿效福州守真堂的傳教方式，乘船在長沙周邊鄉村福音佈道。及至庚子教案後，佈道團返回長沙且逐漸有較為穩定的傳教活動。(93)

上述可見，守真佈道團在短短幾年間的佈道成效，於福州、長沙、上海建立守真分堂。不過，當他們積極投身宗教事業時，亦付出相應的時間、學業等代價。作為天津守真堂第一批信教受洗的醫學生柳資生，他在醫學堂每個假期，都跟隨伍約翰在華北地區佈道，亦是守真佈道團發起人之一。(94) 自1896年在北洋醫學堂畢業後，柳資生擔任天津守真堂中文事工助手，負責主日禮拜講道及婦女和兒童主日學培訓等工作。直到他準備前往上海任職醫生之時，卻於1898年11月25日突染天花病毒過世。天津守真堂為了紀念他的貢獻，專門以柳資生名義籌資，長期支持山西一名福音傳道人的經費。(95) 另外，張汝舟和張汝川是天津北洋醫學堂的第四屆學生，卻未出現在畢業名單。(96)其中緣故是張氏兄弟在1897年，向北洋艦隊福祉號水手佈道，並且獲准登船，但卻被一隊士兵逮捕關押到牢獄。儘管他們身陷囹圄，仍向周圍囚犯傳福音。且後，北洋醫學堂付出六百兩銀子，令到他們二人獲得釋放。然而，北洋醫學堂以違反校規為由，拒絕他們重返醫學堂，以致於張氏兄弟最終未能完成學業。(97) 以上幾個案例，都凸顯守真堂第一代基督徒，在熱衷佈道所要付出的身體代價與家庭、社會成本，這說明佈道團所面對在中國社會的真實挑戰。(98)反過來看，由西教士帶來的普世傳教運動，衍生了中國人在本土組成

(87) "Alliance Work in Shanghai," *Research and Reference Material on the History of The North and Central China Mission of the C&MA, Volume One: 1888-1934*, (in the C&MA National Archives),240.

(88) K.H. Woodberry, "Five Years in Tientsin." (7 July,1900),2.

(89) "Annual Convention at New York City."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Vol. XXIII, No.21 (21 October,1899),338; "North China Mission," *The Report of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for 1900*,70.

(90) "Work in Tientsin."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Vol. XXI, No.2 (13 July,1898),43.

(91) "Letter from Tientsin."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Vol. XXIII, No.21 (21 October,1899),339.

(92) K.H. Woodberry, "Five Years in Tientsin."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Vol. XXV, No.1 (7 July,1900),1-3; "Our Foreign Mail Bag,"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Vol. XXXVII, No.22, (2 March,1912),345.

(93) K.J. Woodberry, "The Chinese Situation", (15 September,1900),147.

(94) "Great Missionary Outreach," *Research and Reference Material on the History of The North and Central China Mission of the C&MA, Volume One: 1888-1934*, (in the C&MA National Archives),97.

(95) Mrs. K.C. Woodberry, "In Memoriam."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Vol. XXIII, No.28 (9 December,1899),447.

(96) 朱有瓏 Youxian ZHU編：〈天津海軍醫學堂歷屆畢業生名單〉 Tianjin haijun yixuexiao lijie biyesheng mingdan 【The List of All Graduate Students from Tianjin Navy Medical School】·《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四輯》 *Zhongguo jindai xuezhi shiliao: Di si ji*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Late China Study System, IV】(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頁566-568。

(97) Mrs. Woodberry, "The Work in Tientsin", (17 November,1897),500.

(98) 另外一個例子是李叔青 Shuqing LI 醫生，北洋醫學堂畢業後，李叔青熱衷於信仰，他的母親見他不行醫賺錢，便嚴厲斥責他。作為前景亮麗的醫生職業，李叔青更為關心的是「當我將自己獻給主時，我接受基督為一切，或根本不接受這一切，但這是我的苦楚。」由此可見，傳道人的社會地位與醫生工作的看法，成為他與家人極大的分歧，更說明了清末的中國傳道人處於邊緣的社會地位。Life of Dr. Y. S. Lee, Evangelist, 29.

的守真佈道團，置身於晚清社會民眾的傳教活動，所付出的代價無不影響群眾對基督教的瞭解與接受程度。從一定程度而言，守真佈道團的佈道任務及其挑戰，也表明來自美國基督教世界的宣道會，進入非基督教地域所實現的一種處境化、本土關連性的特徵。



圖二：張汝舟兄弟等人組成的守真堂佈道團⁽⁹⁹⁾

四、天津守真堂的轉向及傳教類型

1900年初伍約翰和王培元從華北地區一直南下，經過蘇州、上海、廈門、汕頭、廣州和香港，歷時四個月，一路上賣出35,000份福音書籍，並考察各地建立守真分堂的可能性。⁽¹⁰⁰⁾除了巡迴佈道的工作之外，守真堂為擴展在天津房屋，租賃更為寬敞且就近人流密集的天津戒酒樓，作日常禮拜堂使用，它坐落於天津英租界海大道和寶士徒道交口處。⁽¹⁰¹⁾ 伍師母述及「我們的前景是光明的，這是進入我們生命中最幸福的一年。」⁽¹⁰²⁾ 然而，看似一片好景，天津守真堂在春季，卻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當時伍師母就說到：

有關天津守真堂的報告，在迄今為止萬里無雲的天空中出現意想不到的烏雲。它現在的房子將被出售，多次的尋找，一直未能在天津找到一座可以向我們學生禮拜堂敞開大門的建築，

(99) 圖後排從左三是張汝舟 Ruzhou ZHANG、左四是張汝川 Ruchuan ZHANG。Research and Reference Material on the History of The North and Central China Mission of the C&MA, Volume One:1888-1934,100.

(100) K.H. Woodberry, "Five Years in Tientsin."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Vol. XXV, No.1 (7 July,1900),1-2.

(101) 天津開埠後，經常有水兵上岸在租界酗酒滋事，給租界治安帶來隱患。為了避免這類事件的發生，當時租界內教會組織特意為這些水兵安排了戒酒會和茶會等一些娛樂項目。後來，一些飯店股東們共同集資自願捐助，在天津英租界的海大道和寶士徒道交口處（今和平區大沽北路和營口道交口南側）循道公會附近捐修了一座二層的戒酒樓，也定名為「規矩堂」。建築成之後，各國的水兵可以在戒酒樓中閱讀書籍，報紙，作各種遊戲。庚子義和團事變中，戒酒樓被拳民火焚毀。羅澍偉 Shuwei LUO：《近代天津城市史》*Jindai Tianjin chengshi shi*【A History of the Late Tianjin City】（北京 Beijing：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1993），頁154。

(102) K.H. Woodberry, "Five Years in Tientsin." (7 July,1900),1.

我們無家可歸。組織完好無損，但「客棧沒有房間」。由於情況非常嚴峻，我們一家不得不前往羅意睡覺的小墓地，在他的墓地附近坐下，便意識到這是天津唯一我們可以稱之為自己的地方。(103)

由此可見，天津守真堂被要求搬離戒酒樓，失去合適的教堂場所，導致伍師母深感憂慮。為何守真堂在天津遇到此困境呢？一方面，天津人以家庭禮拜堂為由，排除守真堂租賃理想的房子之外，基督教聯合教會（Union Church）不認可守真堂的家庭禮拜堂模式，還有就是社區不歡迎開放式中文教學的差會團體。另一方面，此時伍約翰與王培元一同赴美國述職，這使得伍師母一人面對窘境，感到孤立無援。這一切的境遇，使得伍師母有感說到，他們在中國工作還未到七年，而已經到了「第一章的結尾」。(104)

然而，天津守真堂的組織形式和制度，不是永久性的機構，會友以學生和水手為主體構成，相較流動性較高，其目的是建立自養以及致力傳播福音的群體，因此，伍約翰夫婦的主要目標派遣畢業的學生分散在各地，或者在工作崗位上共同推動在傳教事業。為此，伍師母堅信天津守真堂遇到無法定居的困境，這也是分派他們出去的契機。(105)

是年5月3日，在中國內地會傳教士密爾斯夫婦家中，伍師母與信徒舉行離別前的聚會。(106)值得一提的是，多年後北洋醫學堂的學生已自主開展宗教活動，並且福音果效頗佳。北洋醫學堂學生施伯聲在一篇1906年學生歡度聖誕節的文章談到：「天津北洋醫學堂歷年所募諸生，多是粵人，目下新舊生三班約四十餘人，其中信教者約十有五人。本年春杪，新班廿餘人，初設每晚粵語解經祈禱會。至秋間，福州學生，又設每晚祈禱會。」(107)

5月過後，伍師母偕同三個孩子前往山東英租界威海衛渡假。然而，就在他們離開不到一個月，從河北和山東開始的義和團變亂嚴重波及天津縣，造成社會崩亂、人心動蕩。(108) 他們焚燒天津的教堂、衙署、洋行、商店和火車站，於6月17日拳民聯合清軍炮擊租界，由此對其展開持續27天的圍困戰。(109) 伍師母收到學生的信件，描述到義和團屠殺天津教民的慘景，「殉道的本土基督徒每天都增加在一份更長的名單，暴行無處不在。」(110) 同時，伍約翰在天津寓所的書籍、畫卷和鋼琴等物品都被拳民燒毀。(111) 從姜文熙醫生一信件中說到，他們慶幸伍約翰夫婦及家人，在義和團運動爆發前，離開了天津得以生存。(112) 到了7月份，為了避開日趨嚴重的暴亂，一艘英國炮艇將伍師母等人送往日本橫濱。在美國的伍約翰牧師，決定他們一家人匯合到上海。(113) 是年9月5日，伍師母與孩子先從長崎抵達上海。(114) 至此，在歷時五年的天津守真堂落下帷幕，轉向上海另闢新章。如伍師母的記述：「在這充滿美好和

(103) Ibid.,3.

(104) J.H. Woodberry, "China."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Vol. XXV, No.2 (14 July,1900),28.

(105) Ibid.,29.

(106) K.J. Woodberry, "The Chinese Situation." (15 September,1900),145.

(107) 施伯聲 Bosheng SHI : <教會新聞：各省：北洋醫學堂慶賀主誕記> Jiaohui xinwen: Gesheng: Beiyang yixuetang qinghe Zhudan ji 【Church News: Every Province: A Record of Beiyang Medical School Celebration of Christmas】·《真光月報》Zhenguang yuebao 【True Light MOnthly】第5卷2期(1906)：20-21。

(108) K.J. Woodberry, "The Chinese Situation," (15 September,1900),145.

(109) 劉孟揚 Mengyang LIU : <天津拳匪變亂紀事> Tianjin quanfei bianhua jishi 【A Record of Fist Box Turmoil in Tianjin】《義和團文獻彙編》Yihetuan wenxian huibian 【Collection of Fist Box Materials】第二冊(台北 Taibei：鼎文書局 Dingwen shuju 【Dingwen Press】·1973)·頁7-43。

(110) K.J. Woodberry, "The Chinese Situation," (15 September,1900),145.

(111) Ibid.157.

(112) "Letter from Dr. Kiang."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Vol. XXV, No.22 (24 November,1900),286.

(113) *Miss Ora Woodberry* (Taped April 13, 1962),8.

(114) K. C. Woodberry, "Beginning Work" in Shanghai."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Vol. XXV, No.22 (24 November,1900),286.

平的五年時間裡，傳教運動寫下篇章，這篇章將永遠存留，是對上帝在異邦土地上奇妙工作的紀念。⁽¹¹⁵⁾

從傳教士伍約翰夫婦創立守真堂性質來看，宣道會是相對民主制度的差傳組織。在注重普世福音精神的宗旨下，傳教士享有較大的自主空間，由天津的業務站到守真堂的設立，再到全國範圍的傳教運動，無疑是形成宣道會早期在中國一種傳教團的類型。由此可見，宣道會的重要特點是，一切以傳播福音為核心，至於就傳教站採取的措施或決議而言，其實往往得到傳教士多數同意即可，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守真堂形成自己的管理方式和工作方法，從而這種較為簡易的組織團體，為守真堂在華傳教運動的發展進度提供一定的能動性。



伍約翰牧師一家合影（約在1900-1901年）⁽¹¹⁶⁾

結論

一直以來，「本土化觀點」在研究在華基督教方面是繞不開的一個角度，而本土化觀念的詮釋，學者有持不同意見。最早期是指「福音應以本土文化方式傳播」的意思。⁽¹¹⁷⁾ 後由台灣學者黃彰輝提出「處境化」（或實況化）概念代替本土化，他主張基督信仰在地域對政治、文化等社會處境的影響，而非停留在福音傳播的方法。⁽¹¹⁸⁾ 毫無疑問，宣道會傳教士伍約翰夫婦來華傳教的目標是讓中國人歸信基督教，但他們從一開始是否思考過本土化或處境化問題則無法考究。不過，他們在天津守真堂成立之前，美國

(115) "Alliance Work in Shanghai", 241.

(116) *Research and Reference Material on the History of The North and Central China Mission of the C&MA, Volume One: 1888-1934*, 288.

(117) 溫以諾 Yinuo WEN: 《中色神學概覽》 *Zhongse shenxue gailan* 【An Outline of Chinese Indigenous Theology】（香港 Xianggang: 天道出版社 Tian Dao chubanshe 【The Heavenly Logos Press】·2015）·頁32

(118) Shoki Coe, "Contextualization as the Way Toward Reform," *Asian Christian Theology: Emerging Themes*, (Philadelphia: The Westminster Press, 1980), 52-53.

宣道會有意委派他們負責華北地區的物資代理工作，但他們與天津地方社會接觸並持續發生關聯，比如利用英文的會話和開放家庭資源，向北洋醫學堂等學生群體及水手身份的人傳福音，建立和發展天津守真堂。其活動就因應地方社會環境的實踐傳教，所建立的教會融合了本土區域因素，進而越來越具有本土化特徵。本土化因素包含以城市為基地，而且在附近地區鄉村短途遊歷，以期將福音傳至範圍更大地區，從天津鄉村社會到華北地區的社會民眾中吸納他們信教，這種傳播方式成為天津守真堂最基本的傳教模式。再則，本土化因素本身也包含傳教士注重與初信的學生等中國人，共同致力承擔向華洋並舉的福音使命。可以說，天津守真堂的本土化現象，反映在并非主張建立恆久性的宗派教會系統，這是符合當時美國宣道會創立的差會宗旨，一切工作附屬於「傳福音」的成績單。因此，本文通過闡述天津守真堂的佈道事業，展現他們注重普世福音在地方社會關聯性的傳教特徵。

就天津守真堂的發展而言，美國宣道會並不是佔主導的角色，而是伍約翰牧師夫婦與守真堂信徒發揮關鍵的作用，尤其是守真堂參與的傳教方式頗具特色。他們不限於天津的傳教工作，在經費上支援不同國家數十位福音傳道人，並且守真佈道團相繼在國內創立福州守真堂（1897年）、長沙守真堂（1899）與上海守真堂（1899年），反映出守真堂延續普世福音運動的精神，亦展現了中國本土化佈道團的先行範例，守真堂的擴展得力於一群學生信徒恆常支持及投身佈道事業。有學者說到，守真佈道團是中國首個普世性佈道組織，產生的青年學生是中國基督教復興運動的先聲。⁽¹¹⁹⁾至此，作為西方外來的基督教，經過守真堂的傳播，已不是被動依靠西方資源，而是圍繞以中國人為中心，實現福音對國人的影響。這種身份實踐也呈現之後階段的上海守真堂歷史，亦在二十上半葉上海地方社會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唯篇幅所限，擬另文探討。

English Title:

A localized evangelical movement from the West to Tianjin: Focus on the action experience of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s Tianjin Beulah Church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1895-1900)

Buxiao NI

Alliance Bible Seminary(HK) Christianity & Chinese Culture Research Centre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Chang Chou, Chang Chou shandingdao No. 22, Tel:(852)94019227, Email: nehemiahnee@163.com

Abstract: From 1895 to 1900, American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missionary John Woodberry and his wife carried out missionary activities in Tianjin, China. They preached among students and established churches, and then extended their missionary scope to the whole country, which was different from the missionary mode of other parishes and did not limit their missionary scope to a certain reg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Gospel movement carried out by Tianjin Beulah Church in a short period of five years, and explains their experience and logic of the universal Gospel spirit, thus proving that Tianjin Beulah Church is one of the early local evangelical groups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Keywords: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Tianjin, Beulah Church, local evangelical groups, Missionary movement.

(119) 羅元旭 YUANXU LUO: 《七個華人基督教家族與中西交流百年》 *Qige Huaren jidutu jiaozu yu Zhongxi jiaoliu bainian* 【Seven Chinese Christian Families and One Hundred Years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West】（上海 Shanghai：三聯書店【Sanlian Bookstore】·2014）·頁354；吳秀良 XIULIANG WU: 《李叔青醫生》 *Shuqing Li yisheng* 【Doctor Shuqing LI】·頁13。